

废墟上的升华：汶川地震文学书写研究

彭秀银 张堂会

内容提要 汶川地震文学体裁形式完备,主题内容复杂多样,风格多姿多彩,接续了感时忧国的传统情怀,有力地提振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汶川地震文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创作上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的困境,一些作品较为清浅,缺乏深沉的内涵与意蕴。汶川地震文学既要抚慰伤痛,更要抵抗对灾难的遗忘,建构地震灾害的文化创伤,指引一种政治行动与社会责任。

关键词 汶川地震 地震文学 审美救赎 写作伦理 文化创伤

彭秀银,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225002

张堂会,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25002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震撼世界的8.0级特大地震,一时间举国悲痛,当代文学也深深地介入这场国殇之中,涌现了大量的地震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如今,汶川地震已经过去十个年头了,但它留在人们心中的伤痛还没有磨灭,关于汶川地震的文学书写还在陆陆续续地出现。

一、汶川地震文学体裁形式完备

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影响,当代诗歌一度处于低迷状态。汶川地震促发了诗歌创作的井喷现象,无论是雷抒雁、李瑛、张学梦、徐敬亚、王小妮等名家,还是不知名的草根诗人,纷纷在报纸、期刊、网站等各种媒体上用诗歌表现自己对汶川的关注,诗歌创作一时蔚为大观,评论家王干把这次地震诗潮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四次全民诗歌运动”。“据统计,5·12汶川大地震发生至今,全国大约有200余家刊物发表了地震诗歌一万首以上。”^[1]一些出版社也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各种版本的地震诗集,既有全国性的诗选,也有区域性的诗选,还有个人的著作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的《有爱相伴》、岳麓书社选编的《五月的殇咏》、珠海出版社编的《瓦砾上的诗——5·12汶川大地震祭》、赵丽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然灾害与当代文学书写研究”(项目号12BZW117)阶段性成果。

[1]姜红伟:《5·12汶川大地震诗歌专刊增刊刊出版备忘录》,2012年6月15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0c6890100d436.html。

主编的《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刘满衡主编的《国殇——献给5·12汶川大地震蒙难者和英雄们的歌》、吴兴人主编的《废墟上的升华》、陈寅主编的《汶川——“5·12”诗抄》、苏历铭选编的《汶川诗抄》、李瑛编的《感天动地——汶川大地震诗歌记忆》、海啸等主编的《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聂珍钊等编的《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柳柳等著的《珍藏感动——汶川·生命之诗》等，“全国共有70多家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了100余种地震诗集”^[1]。

诗歌由于短小精练，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因此汶川地震后表现这场地震灾难的诗歌层出不穷，抒发地震所带来的心灵震惊，思念罹难的人群，关心和抚慰幸存者的感情，歌颂坚韧的生命，赞扬军民奋不顾身的救援行动，歌颂党和政府迅捷的救灾行动。诗歌长于抒情，加之其平仄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与传诵，因此成了灾后最适合的情感表达的载体。汶川地震诗歌体式众多，堪称完备，既有新诗，也有旧体诗词，还有歌词（像王平久的《生死不离》）。其中以新诗居多，既有长诗（如海田的《血脉》，全诗共有二千六百行），也有短诗，还有微型诗（如车前子的《2008年5月12日》，全诗仅有六行三十六字）。新诗中以短诗居多，如常建世的《汶川，诗歌疼痛的中心》、凹凸的《那一天》与黄礼孩的《汉字》等；也有组诗和外一首、外二首、外三首甚至外四首等。组诗有西库的《废墟上的守望》、苏浅的《请你来爱我——汶川祭》与张红果的《招魂》等；外一首有王家新的《哀歌》、凌越的《毕竟还可以哭泣》与白白的《躺在废墟中的孩子们》等；外二首有徐敬亚的《第一次，我失去愤怒》、白雪的《震在我心中》与灯灯的《今天我抑不住自己的悲伤》等；外三首有王小妮的《2点28分的鸣响》与黄礼孩的《爱是死亡惟一害怕的眼睛》；外四首有典裘沽酒的《民族与灾难》。

小说由于其反映的社会容量较大，能够从容地展开对生活的叙述，在描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各类体裁中显得较为突出，仅长篇小说就有近二十部，代表性的作品有歌兑的《撕裂》、骆平的《隔绝》、虞慧瞳的《全中国都下雨》、李希闵的《救赎》、李牧雨的《亲亲伙伴——震后孩子们的心灵抚慰故事》、张健的《成长在青川》、李先钺的《我前面桃花开放》、关仁山的《重生——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祭》、闫星华的《震区》、贺享雍的《拯救》、钟正林的《山命》、杨贵云的《县委书记》、安昌河的《断裂带》、姜明的《寻根》、白云的《国家血脉》、梁佐政的《映秀湾》等。

关仁山以唐山大地震、汶川地震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重生》，描写了汶川地震救灾与重建的过程，展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光荣传统，谱写了一曲灾难之中的人性之歌。歌兑作为一名军医率领医疗队伍参加了救援工作，耳闻目睹了灾难中的许多残酷情景，在救援工作结束之后，经过两年的思索和酝酿，创作出了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撕裂》，以一个军医的眼光对大地震进行哲理思考，直击苦难现场，深入剖解人心，用文学的方式对那场国殇进行特殊的祭奠。

汶川地震给报告文学带来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机会，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总是冲在灾害的最前沿，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拥抱当下社会生活。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十几万大军奔赴灾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奋战在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他们在地震废墟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特殊考验。报告文学工作者深入各类抗灾抢险第一线，记录下中国军民抗灾抢险的感人事迹。徐剑的《遍地英雄——第二炮兵部队抗震救灾实录》、张晋生的《遍地英雄》、李明生的《震中在人心》、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赵瑜和李杜的《晋人援蜀记》、张蜀梅的《生死一线：汶川大地震九天纪实》、中国作协编写的《悲情与壮歌》等报告文学都较为逼真详实地刻画了抗震军民的光辉形象，在北川，在绵阳，在唐家山堰塞湖，到处都有他们坚毅刚强的身

[1]姜红伟：《5·12汶川大地震诗集出版备忘录》，2009年5月10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0c6890100d436.html。

姿,他们争分夺秒地决战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此外,还有不少描写灾害的散文、戏剧、广播、电影、电视剧本、纪录片等。李西闽长篇散文《幸存者》记录自己的受难经历,“还原了一段悲剧时光,也为人类的大爱、勇气,写下了个人的颂歌。他在文字里重温了活着的意义,而关于活着之幸福感的崭新理解,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共同领会”(颁奖词),此文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电影《惊天动地》讲述了某集团军摩步旅旅长唐新生在演习途中突然遭遇汶川大地震,通讯中断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他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灾情视作最高命令,毅然带领自己的部队克服重重险阻赶赴汶川进行生死救援。

二、汶川地震文学主题内容复杂多样

汶川地震文学主题内容复杂多样,既有山崩地裂的苦难和人们悲壮的抗争,也有灾难带来的生命启示与人性的光辉,还涉及环境与生态问题,表达对自然的敬畏。

朱玉的《天堂上的云朵》描写了震后北川县城的惨状:“最靠近河岸的房子,后面有冲下来的房子作为巨大的推力,前面是陡峭的湔江河槽,只好空翻倒进湔江的河道中,使河槽原本90度的直立陡坡,变成了缓坡。一座原本建筑在河边的房子,被连震带推,彻底粉碎性倒塌。但是,它的房顶部分,被从距房顶半米处,狠狠削掉。”^[1]杨秀丽的诗歌《写在大地震摇动的时刻》描写汶川地震的惨烈情形,可是自己作为诗人又如此无力,只能用诗歌亲吻祖国母亲忧伤的额头。“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黑色的瞬间,/五月的中国啊,天崩地裂,山峦震动,/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摧折祖国母亲的筋脉? /有什么可怕的力量在揉断她的骨骼? /有什么巨大的手在捣鼓她的血肉?”^[2]周碧华的诗歌《那手,那支笔》,紧扣“手”与“笔”的中心意象,把最美好的、最痛楚的、最惨烈的几个矛盾元素融入诗中,书写钢筋水泥丛林里无辜的青春在萎缩,盛开的梦想在凋零,赞美了孩子的坚定与抗争,抒发对遇难学生的哀悼之情,读后让人泪流不已。“孩子 生命的最后一刻/那支笔被你攥出了泪滴/你对生命的渴望/让活着的人不敢呼吸……那一刻 我听到你的骨骼吱吱作响/柔嫩的身体压满了钢筋和水泥/那支笔在痛苦地痉挛/那支笔像你一样没有哭泣。”^[3]同样是悲悼罹难的学生,邹旭的《哭泣的书包》以书包的口吻去寻找往昔熟悉的稚嫩的肩膀,最终只能成为没人背的书包,留在废墟里陪伴主人一起安息。“啊!你! /温暖的脊背/稚嫩的肩膀/从此不能高兴/背着我/往学堂的路上走/我! /成了没人背的书包。”^[4]

面对突来的巨大灾难,人们一方面感到自身的渺小与无助,另一方面也在灾难激发下萌发了强健的生命力,能够面对乱石崩云的危险情境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农业银行北川支行的龚天秀被困在废墟中,砸腿饮血断肢求生,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用坚韧顽强的意志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第三天,消防队来了,开始营救她。水泥板抬不走,先把一些小的墙渣搬走后,露出了盆子大一个洞。一个武警战士把头伸过来,还能碰到她的手。她告诉这个战士,自己把腿砸烂了,还剩下一些皮肉连着,让他去找把锯子,好把腿锯掉。皮肉锯断了,筋还连着,她又要来剪刀,前前后后弄了半个小时,终于把右小腿弄掉了。爬过一段距离后,终于获救。”^[5]《坼裂》中描写医生卿爽在救治废墟中的孕妇时所承受的心灵的炼狱,孕妇手臂全部损烂找不到血管注射麻药,而抢救时间只有两分钟,她只能采取直接剖腹的方式取出婴儿。一阵眩晕之后醒来,她准备再进废墟为孕妇缝合伤口,观察震情的士兵下达了必须撤离现场的军令。虽然有人说孕妇其实早死了,但卿爽还是愧疚万分,不住地念叨:“她

[1]朱玉:《天堂上的云朵——汶川大地震,那些刻骨铭心的生命记忆》,《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21期。

[2][3]吴兴人主编:《不屈的国魂:汶川大地震诗歌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第14-15页。

[4]赵丽宏、吴谷平主编:《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5]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生命的感动: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还在里面,她还在里面”。

灾害来临之际,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得到大力弘扬,几乎到处都是一片互济互助的感人场景。灾害能够烛照出人性的光芒,使得隐匿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浮出地表。汶川地震期间,民警蒋小娟将六个月的儿子送到乡下婆婆家,自己则每天在灾区执勤。在灾民帐篷区,一名婴儿由于母亲还在医院抢救已经三天没有吃奶了,她撩起衣衫轻轻地将乳头塞进婴儿的嘴里。两天之内,蒋小娟就用自己的乳汁救助了八个娃娃。高丹宇的《警察妈妈》赞扬了这位普通民警宽厚的母爱与温暖的人性,刘功业的诗歌《母爱无疆——致蒋小娟》也赞扬了蒋小娟对灾区婴儿圣洁的母爱,让人联想起沂蒙山红嫂的美丽情怀。“你,只是一个六个月孩子的年轻妈妈/乳汁一样汹涌的爱意,充盈着你骄傲的乳房/你丰满的胸脯,袒露在这西南大山5月悲情的阳光里/袒露得那么多,那么自然,让幸福自然地战胜了悲怆。”^[1]

汶川大地震中像蒋小娟这样的普通人物还有很多,他们在灾难中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芒,不顾自己家庭和个人的安危,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四川省绵竹市西南镇镇长付兴和忙于指挥全镇抗震救灾工作,顾不上被埋在学校废墟之下的儿子。由于一心扑在抢险救灾上面,他无暇顾及被抢救出来的儿子的伤情,儿子最终因砸伤导致呼吸系统障碍而死亡。诗歌《父亲的愧疚》写出了父亲对儿子的愧疚,更赞扬了一个父亲在地震中的担当。“高大健硕的身躯/能担当安危冷暖的职守/却不能为深埋废墟的儿子/遮风挡雨/宽厚有力的双肩/能挽扶摇摇欲坠的家园/却顾不上自家震后零乱的四壁。”^[2]

由于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正值上课期间,学校所遭受的灾情特别严峻。一些教师坚守在普通的讲台上,迸发出闪亮的人性之光,出现了谭千秋、王周明、向倩、袁文婷、周汝兰等一批英雄人物,用他们的生命与大爱谱写了一曲曲高尚的园丁之歌。谭千秋老师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死死护住学生,孩子得以存活,而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张开双臂/竖起大爱的悬梯/躬身为巢/守护惊恐的羽翼/让生命攀援生命/让果敢抵挡不期/四个生命复活了/你却长眠于废墟/不死的背影/灼痛共和国的记忆。”^[3]

现代化进程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人们认识到现代科技理性不是万能的,开始质疑并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愈来愈重视环境与生态问题。“5·12”大地震过去一年之后,四川作家李先钺撤离撕裂人心的灾难现场,创作了长篇小说《我前面桃花开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度思考。小说记叙主人公“我”(骗匠殷生雨)和老中医阳生云行走乡间为乡民骗牲畜和治病,受到乡人的尊敬与爱戴。他们秉承了祖先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与万物生灵为伴,呵护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作者通过远古神话告诫我们不要对自然过度索取,否则自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南河村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滥伐森林,开山采石,下河挖沙,对自然进行肆意的掠夺。老中医预言南河村早晚会被遭到报应,果不其然,南河村在一场地震中化为废墟。作品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两个村庄截然不同的情景,东河村人注重生态与环境保护,靠山吃山,走发展森林蔬菜的路子,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使得东河村不但免遭灭顶之灾,还呈现出别样的生机与魅力。“我努力去寻找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转述方法,去超越小说娱乐化、消费化的趋向,把生存环境的警示问题作为一种倾向具体描写,从灾难现场的情绪中挣脱出来,获得拉开灾难现场距离的思考。”^[4]作家对生命和自然保持一种敬畏,把灾难和苦难的记忆变成一种对今后的警示。“自然灾害在不断地威胁着我们,曾几何时,我们是否也扮演过破坏自然生态的罪魁祸首?如果是,那灾害的根源还在我们人类自身。至少,面对自然灾害,我们也该痛改前非了!”^[5]

[1]刘功业:《母爱无疆——致蒋小娟》,文松辉主编:《汶川情,中华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2]高丹宇:《父亲的愧疚》,2008年5月24日,<http://www.poemlif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52>。

[3]高丹宇:《谭千秋》,2008年5月22日,<http://www.poemlife.com/thread-8847-1-1.html>。

[4][5]李先钺:《我前面桃花开放》,〔成都〕《青年作家》2010年第5期。

三、汶川地震文学风格多姿多彩

由于创作主体姿态的不同,在如何表达汶川地震时打上主体鲜明的印记,汶川地震文学风格便呈现为多姿多彩的局面。

在描写汶川地震的文学作品中,歌兑的长篇小说《坼裂》风格鲜明,无疑是一篇标新立异的上乘之作。地震题材的小说大多以地震为背景表现人间大爱,以温情打动人心,表现人在灾难面前的勇敢无畏与坚强,比如《唐山绝恋》《劫难》《废墟狼嚎》等。《坼裂》突破了一般地震文学书写的规范,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一方面是患有现代心理病的患者,另一方面又是无数灾民赖以求生的救赎者,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展现人性坼裂的现状,寻求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重铸,对灾害的文学书写进行了另类拓展。

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写法上更是别具一格。曾几何时,我们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报道中看到的多是激昂悲壮的痛哭与呐喊,习惯的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李春雷却用舒缓平静的叙述给我们讲述了夜宿棚花村的所见所闻,在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下面暗藏着生命血流的奔突与人性光辉的闪电,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一种心灵的震颤与体验。李春雷描写了自己在棚花村看到的一个普通的劳作场景,一个年轻的村妇在挥动连枷捶打油菜棵子,在“两臂猛力地挥舞着连枷”“冲着地球撒气”“金属般的响声爆裂开来”等话语的背后,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普通村妇内心涌动的情绪,既有对老天不公的诘责,更有忙着抢救抗争天灾的不屈意志。这种坚韧顽强的意志丝毫不逊于那些吸引眼球的慷慨激情,它代表的是汶川人民在特大地震面前英勇不屈的形象。《夜宿棚花村》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四外的帐篷里,渐次亮起了蜡烛,烛光幢幢中,妇人们在准备着各自的晚餐。男人们呢?坐在帐篷外,抽着烟,似乎又恢复了原来的本性,开始吹嘘各自的传奇和历险。稠稠的暮色中,不时有笑声弥散开来。一簇簇炉火燃起来了,一缕缕炊烟飘起来了,小村的黄昏在慢慢地浑厚和丰富起来。”^[1]这些暖意融融的乡居图景带给我们一份感动,在农人的笑声里看到了灾难中的生机与欢乐,这就是对抗苦难的人性光辉与力量。作家利用夜宿棚花村的机遇,把自己彻底融入棚花村的人们中间,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和触摸这个刚从惊恐中安静下来的乡村的灵魂与脉搏,聆听村路上留下的一串清脆的脚步声,看着棚花村人背着竹篓、扛着连枷、拎着镰刀的忙碌身影,发现了棚花村人灾难重压下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牵着手,正在一步步地走出灾难,走向阳光,由无序到有序,由慌乱到镇静……”^[2]结尾写了自己在棚花村“忙忙的五月”中,“酣酣地睡着了,连梦里也开满了黄灿灿香喷喷的油菜花”。这些从容舒缓的诗性语句传达出了对灾区人民平静生活的深深祈祷与祝福,从而拉开了与其他报告文学的距离。

四、关于汶川地震文学的思考

汶川地震文学反映了中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画卷,记录了那些楼房塌陷、道路断裂、激流汹涌的悲壮历史场景,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凯歌。与唐山地震文学相比,汶川地震文学出现了一些新变,如高扬人道主义旗帜,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诗歌《默哀三分钟,我们一起守望永恒》通过赞扬国家设立哀悼日降旗致哀悼念灾难同胞的举措,写出了生者与遇难者休戚与共的血脉亲情,传达了生命至上的理念,揭示他人的伤痛与我们密切相连。“放下手中的活,此刻,时间为你们空白。/停下匆忙的脚步,此刻,行程为你们停顿。/半降的国旗,肃然哀思。/长鸣的汽笛,悲声同泣。/

[1][2]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编:《2008中国报告文学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第207页。

所有的头颅,都虔诚的低下,/在最可敬畏的生命面前,心跳的声音,/依然是那样清晰,有力。”^[1]

汶川地震文学凸显了文学的审美救赎功能。地震中那么多灾难与悲痛成为压在人们心灵上的“坟”,文学提供了一个宣泄民族悲情的渠道,让人们在文学的审美中得到心灵的救赎。李西闽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底下长达76个小时,身心遭受了严重的创伤,为了医治心灵的伤痛,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救赎》,讲述汶川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何国典跟随打工的妻子来到上海,一步步克服现实生活的困境最终走向自我救赎的道路。李西闽正是通过《救赎》的写作来进行自我心灵的救赎,医治好了自己的创伤。汶川地震文学开始关注人们的心理问题,特别是儿童的心理救援受到重视,表现了科学的救灾精神。以往我们通常会忽略孩子们的心理与承受能力,片面地强调“不哭”“加油”“挺住”等,其实这并不利于孩子心灵恢复。汶川地震文学许多作品的名字就标明了心理援助、心灵抚慰字样,如诗歌《写给灾区孩子们的心理援助诗》,还有长篇小说《亲亲伙伴》的副标题就叫作“震后孩子们的心灵及抚慰故事”。

汶川地震后,“志愿者”作为一个群体第一次出现在了灾难报告文学的作品中,如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志愿者”们的行动在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群体精神和公民意识。志愿者们的行动和事迹令人感动,当中有志愿在灾区当交通协管员的沈阳张女士,有送药志愿小分队队长浙江老板林云,有清理尸体的重庆志愿者,有驰援都江堰的的哥,有身着便装的国家救援队的编外人员陈岩,还有奋战一线的“中国首善”陈光标。甚至一些孩子也自觉地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希望用稚嫩的翅膀为灾区撑起一小片晴空。“在高水社保定点医院,来了两位小朋友,一位是跃进路小学11岁的白宛茹,另一位是高水小学12岁的刘可心。地震后学校停了课,5月13日即地震后第二天,他们便来到医院做起了志愿者。他们从每天早上7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别看他们年龄小,他们可不是来这里添乱的,看看他们娴熟的动作,活像一名小护士。倒尿盆、洗衣服、做饭喂饭样样都干。”^[2]

汶川地震文学接续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传统,延续了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情怀,扩大了当代作家的表现视野与精神境界。龚学敏的《汶川断章》、典裘沽酒的《民族与灾难》、汤养宗的《瓦砾中的中国》都把这场灾难与民族危亡紧密地联系起来。王干认为:“汶川地震发生以后,人们把对灾区的关注,升华为对祖国的关注,把对灾区群众的热爱升华为对民族的热爱。这种升华,是自然的升华,是发自内心的升华。中国在地震诗中,成为一个坚强的、坚固的、庞大的形象。”^[3]地震灾害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地震文学创作成为一种“民族救亡”的行动,在私人化、市场化、物欲化的文学大潮中有力地提振了民族精神,培养了公民的悲悯情怀和志愿服务意识。汶川地震文学把文学与社会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

与以往的灾害文学相比,汶川地震文学出现了以上几方面新的特质,表现出较为不同的新气象与新格局,可以说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汶川地震文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汶川地震文学创作上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的困境,一些作品的情感体验、语言表述和思想主题往往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出现了相同题材作品扎堆的情形,这一点在汶川地震诗歌中尤为鲜明。“写孩子在废墟下读书的,有谭旭东的《废墟里读书的孩子》、洪烛的《废墟下读书的女孩》与十鼓的《废墟下读书的女孩》等为题之作;写汶川别哭的,有唐池子的《汶川,请别哭泣》、黄芳的《汶川,别哭》、李浔的《别哭,汶川》、马东旭的《汶川,别哭啊,别哭》与风之点的《别哭,汶川》等为题之作”^[4],此外歌颂英雄教师谭千秋

[1]刘满衡主编:《国殇》,〔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2]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生命的感动:四川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纪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73页。

[3]王干:《在废墟上矗立的诗歌纪念碑——论“5·12”地震诗潮谈》,〔成都〕《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4]王美春:《汶川地震诗歌漫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与赞美警察蒋晓娟的同名诗作也比比皆是。

其次,汶川地震文学缺乏应有的沉淀,灾难事件与创作的同步性使得大部分作品带有一种清浅的特征。面对突发的灾难,创作者急于抒发郁积于心的感情,根本无暇打磨就迫不及待地拿出自己的作品,同时各个出版社也在短时间内争相出版各种地震文学作品集。“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也认为感情浓烈是不宜作诗的,“否则锋芒太露,能把诗美杀掉”。大多数人没能沉潜下去去观照审视灾难,出现了一哄而上的创作局面。汶川地震文学的浅表性使得大多数作品无法穿越灾难的表层迷障,没能作更深层次意蕴的思考与开掘,只是停留在各种苦难的展览、救援英雄的颂歌与多难兴邦的国族认同层面,“意义空间的局促与空乏已经成为灾难写作进一步深化的最大制约因素。”^[1]

如今,汶川地震过去十年了,关于汶川的灾难记忆还保存几许?那些遇难的同胞、那些失去亲人的痛苦、那些涕泪滂沱的场面,早已被灾后重建的礼炮轰得一干二净,现如今除了他们的亲人之外,还有几个旁观者能忆及?作为抒发宣泄民众悲情的地震文学曾经热闹非凡,特别是喧嚣一时的地震诗潮逐渐消退,只有一部分对大地震怀有浓烈情怀并坚守文学理想的人还在默默守望这场灾难,陆陆续续地推出一些关于汶川地震的小说、散文等,特别是一些长篇小说,如白云的《国家血脉》、姜明的《寻根》、梁佐政的《映秀湾》等。

面对大地震造成的巨大灾难,文学该如何去表现才能不失重。地震文学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单纯地记录渲染各种灾难,这方面的工作新闻影像的效果比文学来得更为直观。描写地震灾区的真实情景只是地震文学表现的第一重境界,作家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境界追求,能够通过地震灾难表现大自然重压之下人们悲壮的抗争,彰显生命的崇高与尊严,进而能够像加缪与马尔克斯那样通过灾难探索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进行一种哲学寓言式的灾难创作。汶川地震文学创作既要抚慰伤痛,更要抵抗对灾难的遗忘,去积极地建构地震灾害的文化创伤。谢有顺认为:“灾难记忆只有转化成一种创伤记忆时,它才开始具有文学的书写意义。”“灾难记忆是一种事实记忆,它面对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事实,这种事实之间的叠加,可以强化情感的强度,但难以触及灾难背后的心灵深度;创伤记忆是一种价值记忆,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伦理反思,它意味着事实书写具有价值转换的可能,写作一旦有了这种创伤感,物就不再是物,而是人事,自然也不仅是自然,而是伦常。”^[2]

作为一种自觉意义上的文化建构,汶川地震文学要能够指向一种政治行动与社会责任,“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3]汶川地震文学要能够昭示大地震不仅仅是一国之殇,也是每一个受难者鲜活的个体之殇,这些伤痛与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连。通过这种地震文化创伤的积极建构,人们得以明辨苦难的存在和根源,尊重生命的尊严,分担他人之痛,担负起人类的生态伦理责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责任编辑:平 啸]

[1]支宇:《灾难写作的危机与灾难文学意义空间的拓展》,〔成都〕《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2]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宁〕《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3]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